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0034286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约·雷·麦克库洛赫著





2 019 0623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 约·雷·麦克库洛赫著

郭家麟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原理

〔英〕约·雷·麦克库洛赫著

郭家麟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131

197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90千

印数 11,300册

印张 7 5/8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6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译 序

麦克库洛赫的经济理论“不但是李嘉图的庸俗化，并且还是詹姆斯·穆勒的庸俗化”^①。这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给予麦克库洛赫的正确评价。

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1789—1864年)生于苏格兰的威格顿郡,最初在爱丁堡大学学法律,不久改学政治经济学。1818年他为《爱丁堡评论》撰写了《关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文,因而博得了李嘉图维护者的名义。1820年到伦敦讲政治经济学。1824年讲李嘉图学说,1825年他以这个讲稿的材料为基础,加进了他过去发表过的一些文章,并利用了马尔萨斯、萨伊等人的一些庸俗观点,扩充为本书。1828年至1832年间,他凭本书在伦敦大学谋取了一个讲座的名义。1838年,他被委任为英国皇家印刷所的主计官,一直到死。

除上述著作外,他还主编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828年初版)和《李嘉图著作集》。1856年以后,他编订了有关货币、赋税等问题的一些论文集,如《有关货币论文集》(1856年)、《有关纸币和银行论文集》(1857年),并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八版写了一篇《租税》。它们都是为当时英国的执政党辉格党的内阁作辩护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正值关于李嘉图学说的大辩论时期,所以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大辩论中的一些主要论点,特别是作者把马尔萨斯、萨伊的论点和李嘉图的论点调和起来的情况。把本书看作李嘉图体系解体过程中的一幅悲惨图景,是很恰当的。

^① 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7页。

503

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发表后的十年论战中,论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价值规律同资本和劳动交换之间的矛盾问题、价值规律同生产价格规律(或者说,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规律)之间的矛盾问题。麦克库洛赫和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这一场论战中以李嘉图理论的“捍卫者”自居,用注释和解说的办法来同反对者马尔萨斯、萨伊、托伦斯等人辩论。当时这些反对者想通过价值规律这个核心问题的争论推翻李嘉图的全部理论。他们常用葡萄酒的例子攻击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说,葡萄酒通过劳动生产过程之后,放在窖里贮藏若干年,不需要增加劳动,价值就会增加。这个情况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所不能解释的。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精辟的说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可以有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有时,流动资本在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前,已经处在生产时间内(鞋楦制造);有时,流动资本在通过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后,仍然处在生产时间内(葡萄酒、谷种)”^①。麦克库洛赫则把葡萄酒增值说成是自然力劳动的结果。他在本书第三章第六节中说:“假定一桶值五十镑的新葡萄酒,放在地窖里,在满了十二个月之后,它值五十五镑,问题是葡萄酒所增加的五镑价值,究竟应该看作是值五十镑的资本被冻结的时间的补偿呢,还是应该看作是实际上对葡萄酒所增加的劳动价值呢?我想,这应当用后面的解释来考虑,因为在我看来,这是最满意和肯定的理由。”(见本书第177页)又说:“每一个人都承认,由机器的作用而转入到这个商品中的价值完全是由劳动得来的,但是,借助于机器的作用,与发酵的作用,以及在桶内完成的其他过程,除了一个能看见,另一个看不见之外,在本质上根本没有一点不同的

^① 《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4页。

影子。”（见本书第 179 页）这里完全可以看出，麦克库洛赫的观点比詹姆斯·穆勒更加庸俗。照穆勒看来，蓄积劳动会劳动，并会创造价值，麦克库洛赫则认为自然力也会劳动并创造价值。可以说，在穆勒那里还留有李嘉图价值论的影子，而在麦克库洛赫那里连这点影子也消失了。萨伊称资本的活动和自然力的作用为“服务”，而麦克库洛赫却称之为“劳动”，这个“劳动”不是人类的劳动，而是自然作用的“劳动”。李嘉图的“捍卫者”麦克库洛赫完全站到李嘉图的批判者那边去了。

在李嘉图无法解决的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矛盾问题上，完全暴露了麦克库洛赫同马尔萨斯是一个样子。他区分了“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他认为前者决定于消耗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后者决定于一定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在商品和商品交换时，价值规律是被遵守的，因为交换是按照消耗在这两种商品生产上的劳动来完成的；在商品和劳动交换时，价值规律则表现为：须用价值相同的商品购买数量相同的劳动。用他的原话来说：“一个为一定量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将一律交换到或买到同量劳动所生产的任何其他商品。但是，它绝不会交换到或买到生产它所费的完全等量的劳动。虽然它不会这样，但总会交换到或买到如它自己一样在同样情况下或以同样劳动量而生产的其他商品的同样多的劳动量。”他在这里还加了一个注释：“事实上，它（指商品——译者）总是交换到多一点，这个多余的部分，便构成利润。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把已经制成的一定量劳动的产品，来交换尚待制造的同量劳动产品。这等于不收取利息的贷款。”（见本书第 125 页）这就是说，在现实市场上，“相对价值”常高于“真实价值”，商品购买到的劳动常高于生产该商品时耗费的劳动，商品常同较大的劳动相交换，二者之间的差额便构成利润。麦克库洛赫自认为这就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回答了利润如何产

生的问题,解决了价值规律同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正是他完全抛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站到马尔萨斯的立场上去了,因为按照麦克库洛赫的上述论述,利润不外是马尔萨斯的“让渡利润”;他表面上以“相对价值”来保持“劳动价值论”,实际上他同马尔萨斯一样都是以资本同劳动交换的错误见解来否定劳动价值论。从本书的结构中也可以看出:书中的第二章是站在李嘉图的立场上提出了劳动价值学说,到了第三章就一方面站在萨伊的立场上扩大了劳动的范畴,另一方面又站在马尔萨斯的立场上以平均利润来否定价值规律。

正如马克思所正确指出的:“麦克库洛赫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拿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做一笔生意。”“麦克库洛赫就是凭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才在伦敦得到一个教授位置。他的职务,本来就是以一个李嘉图派的资格出现,并参加反对地主的斗争。他一立住足,并在李嘉图学徒中取得位置,他的主要努力,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运入辉格主义的限界内,并和一切为辉格党人所不悦的结论相疏远。他的最后的论货币,赋税等等的著作,不过是当时辉格党内阁的辩护书。由此,这个人就得到了发财的机会了。”^①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麦克库洛赫和他的这部主要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多次加以评述,《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中并有专节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对麦克库洛赫等人的庸俗观点的严肃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把本书作为一种参考资料翻译出版,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开展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工作。

本书原文是英文,但其中整段地掺杂着法文及少量意大利文、

^① 参阅《剩余价值学说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1—202页。

拉丁文。在译过程中蒙李迈予、陆曾扬两同志多方协助,克服了不少困难,特此致谢。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错误定所难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 3 |
|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它的重要性 它在希腊和罗马以及中 世纪被忽视的原因 创立结论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在近 代欧洲的兴起 重商主义 魁奈体系及法国经济学家 《国富论》的出版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统计学的区别 | |
| 第二章 财富的生产 | 38 |
| 第一节 生产的定义 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 | |
| 第二节 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方法 一、财产的安全 二、 个人之间的职业分工 三、资本的积累与运用 四、不 同国家之间的分工或商业 货币 | |
| 第三节 资本和劳动的不同运用 农业、工业和商业同样有 利 在不同事业中的投资,由各种事业所产生的利润率来 决定 | |
| 第四节 改善机械的效果与改善劳动者的技艺相类似 不会 引起商品的滞销 有时迫使工人改变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但 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并没有降低的趋势 李嘉图先生对于机械 所假定的情况,有可能但很不容易发生 滞销的真实原因 | |
| 第五节 人口总是与生活资料成比例 人口原理的力量补偿 了时疫与荒歉所造成的破坏 资本和人口的相对增加 | |
| 第三章 财富的分配 | 119 |
| 第一节 两种价值 一、交换价值 它是怎样决定的 使商品交换价值不变的条件 二、实际价值 它是怎样 决定的 使商品实际价值不变的条件 生产一个商品所 需的劳动量不同于它交换时得到的劳动量 | |
| 第二节 工业产品在各阶级间的分配 工资在所有不同产业 部门间的均等 利润的均等 耐用程度不同的资本 | |

第三节 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原则 商品供求变动对价格的影响 垄断的影响 平均价格总是与生产成本相一致

第四节 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商品完全属于劳动者 生产所需的劳动量,那时是决定它们交换价值的唯一原则

第五节 一、谷物或产品地租的性质、起源和发展 地租不是农产品高价值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不构成价格的一部分 农业和工业间的区别 二、货币地租,部分决定于耕种扩充的范围,部分决定于位置 商品的真实价值为生产它们需要的劳动量所支配或决定的规律,不因支付地租而受影响

第六节 生产中使用资本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影响 工资率的变动对交换价值的影响 一、生产中使用耐用程度相同的资本 二、耐用程度不同的资本 在估计价值中不考虑时间因素 高工资率不致使国家的商业处于不利地位

第七节 决定工资率的条件 一、市场工资或实际工资;决定于资本与人口的比例 二、自然工资或必要工资;决定于工人消费所需的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种类和数量;随国家和时期的差异而差异 工资率变动对工人阶级处境的影响 高工资率的好处 使工人依靠极便宜的各种食物以维持生活的好处 高工资不是怠惰的原因 济贫法及教育对工人处境的影响 三、相对工资;部分决定于工人消费物品的数量和种类,部分决定于劳动生产力

第八节 在不计地租下,劳动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利润的定义 李嘉图先生的利润理论;利润的真实意义 引起利润上升或下降的原因 资本的积累,不是利润下降的原因 土地肥力下降以及租税对利润的影响

第四章 财富的消费219

消费的定义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有利消费和不利消费的标准 节俭法的有害作用 爱好奢侈的好处 亚当·斯密关于不生产的消费意见的错误 主张便利生产就必须鼓励消费的错误 政府的消费 结论

译名对照表236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它的重要性 它在希腊和罗马以及
中世纪被忽视的原因 创立结论的依据 政治经济学在近代
欧洲的兴起 重商主义 魁奈体系及法国经济学家 《国富
论》的出版 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统计学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①是研究具有交换价值的、并为人所必需、有用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

我们说一个物品或产品有交换价值，意思就是说有人愿意给予一定量的劳动，或是以通过劳动才能取得的其他一定量的物品或产品来交换它。

某些物品或产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各种需要与欲望的力量或能力，构成了它们的效用，并使它们成为需求的对象。

一种物品可能具有最高度的效用，或具有满足我们需要和享受的能力，并为人们所广泛地使用，但没有交换价值。这就是说，必须以人们的劳动来生产、获得或储藏的那些物品才具有某种属性或性质。不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不能成为需求物；但任何种类的物品，不管它对我们的舒适、甚至于生存是怎样的必要，假如它是自然的产物——假如它不依赖人力而存在——同时，假如每人不费任何力气或某种劳动即能无限量地支配它，它便没有价值，而

^① 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 οἶκος (家或家庭)和 νομὸς (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

且对经济学家不能提供任何考虑的基础。一个商品或产品不因其有用而有价值,而是因其只能以劳动才能获得,才有了价值。认为我们用以止饥肠的粮食和借以御严寒的衣裳,比空气还更有用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粮食与衣裳所具有的那种交换价值,空气是完全没有的。理由是:粮食与衣裳不是空气那样的无代价产品,不费力气便不能在什么时候获得任何数量;相反地,它们必须经常以劳动才能生产或取得;如没有人愿意牺牲他的劳动果实,在交换中就得不到等量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具有交换价值。

经济学家不研究那些自然存在着的、不依赖人力即可以无限量取得的物品的生产和分配规律。只有人们勤劳的结果才成为他所关怀的唯一目的。政治经济学实在可以称为价值的科学,因为没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或者费了劳动而生产或获得的、但不能取得等额报酬的物品是完全不能放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

价值这个名词,不独时常被用以表明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它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而且也用以表明它的效用、或满足我们的需要和帮助我们舒适和享受的能力。但很明显,商品的效用,例如面包的止饥能力,水的解渴能力,和它们交换其他商品的能力是一种完全不同和有区别的性质。斯密博士了解这种区别,并且指出谨慎区别效用,或如他所谓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它们交换价值的重要性。但他在心目中却没有时常保持这种区别,并往往也被以后的学者们所忽视。把这种互异的性质纠缠在一起,无疑地是使这门科学的许多部分,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深奥,至今仍然含混不清与晦涩不明的主要原因。例如,当我们说水有高度的价值,无疑的,我们给予这句话的意义是不同于我们说黄金是有价值的的意义。水是人们生存不可少的,所以有高度的效用,或者说有高度的“使用价值”,但是因为它一般都不需要很多的劳动或努力,即能大量地得到,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有很低的交换价值。在另一方

面,黄金只有比较小的效用,但是,由于它的存量有限,使用大量的劳动,才能得到小量的供应,因此,它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并可以按比例地交换较大量的其他各种商品。混淆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价值,很明显的,将会导致极大错误的结论。因此,为了避免把价值这样一个重要名词的意义弄错,我在以后,除非指明可交换的价值或交换中的价值,将不使用这个名词;而经常以效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一个物品满足我们的需要或欲望的能力。

政治经济学时常被定义为“讨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科学”,如果把财富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并且是必要的、有用的或喜爱的物品或产品,那末,这个定义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扩大或缩小的意义来理解财富这个名词便有缺点了。例如,马尔萨斯先生便认为“财富即是对人们必要、有用及喜爱的物质对象”。纵令我们不反对用物质对象这个词汇,但这个定义仍显然有其重大的缺陷。为了证明这点,只要提及空气和太阳热就够了。二者都是物质的,对人是必要的、有用的和喜爱的物品,但由于它们不依赖人而存在,和不能够特别占有,因而失去了它们的交换价值,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不得不把它们置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研究领域之外。

斯密博士没有明白地说明他对财富这个名词所给予的确实意义,但他通常总是把它描述为“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马尔萨斯先生正确地反对了这个定义,认为这个定义在我们尚不了解财富是什么以前,就指出财富的源泉,并把土地的无用产物和那些为人们所占有与享受的东西都一起包括在内了。

我们现在所下的定义,似乎不致遭受这一类的任何批评。把这门科学限于讨论那些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这样我们便给了它一个明显的和确切的对象。当我们作了这样适当的限制以后,经济学家的研究便具有了一个他

自己所独有的园地。他不致浪费他的时间于其他科学研究的范围内，或者无意义地研究那些不能占有并不依赖人们的劳动而存在的物品的生产和消费。

占有权是构成一个具有财富性质的物品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将坚持使用这个名词来指那些由于人的劳动而获得，同时以后由某个人所占有并由他独自消费的产品。一个人不能因为他对空气有无限的支配权而说是富有的，因为这是他和其他任何人所共同享有的权利，不能构成优越的基础。我们说某人富有，是根据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多少而说的，这些物品不是自然的赐予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些方法使人类的劳动可用之于最有效地生产那些构成财富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方面，说明这些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比例以及它最有利地消费的方式。这样一门科学与社会所有有关方面的内在联系是很明显的。实在的，再没有其他的科学和人类日常的生活与事业有这样密切的关系。财富的消费对人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上帝的永恒规律昭示了，财富只能由勤劳取得——人必须挥汗劳动而取得面包。这个双重需要就不能不使财富的生产成为极大多数人经常活动的主要目的，它克服了人对劳动固有的厌恶，它使人以积极活动替代了怠惰，以热情武装着勤劳的双手，以忍耐克服了最令人厌倦和不惬意的工作。

财富既是如此的必需，获得财富的欲望就足够诱使我们忍受最艰巨的困难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教给人们许多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使对财富的取得，得到最有成效地增进，即运用这些方法，我们能够以最小可能的困难而获得最大可能的财富，这样一门科学，自然是值得细心地研究和深思的。没有一个阶级的人能够认为这门科学是无关紧要或多余的。无疑的，这门科学对某一

些人要比对另一些人更有利益，但对所有的人却都是非常有影响的。各种商品的价格——工业家和商人的利润——地主的租金——日工的工资——租税及其调整办法的归宿和效果，都要依赖于各种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能单独确定与阐明的。

获得财富的必要性，还不仅只是因为它提供我们的生计：没有它，我们绝不能培养和增进我们较高贵的才能。在沒有积聚财富的地方，人们的思想经常为准备身体的迫切需要所占据，沒有多余的时间来发展文化；人们的眼界、情操与感觉都变成同样的狭隘、自私和愚昧。占有适度的资产，或能从事一些不是直接满足我们生理需要和欲望的其他工作，这对于缓和自私情感、改进道德和智力、保证在充分的学习和工作中有一定的造诣是必要的。因此，获得财富不仅仅在于取得当前直接满足需要的东西，而且对于社会在文明与教化方面的促进，都是必不可少的。沒有积累着的财富所提供的安宁与闲暇，则那些扩大我们眼界、纯正我们嗜好、提高我们地位的纯正高雅的学习，将不能成功地实现。可以肯定，国家的野蛮与文明的区分，依靠于积有一定量的财富有甚于依靠任何其他条件。穷国的人民，绝不会文雅；富裕的人民，从不粗暴。不可能举出一个国家，它在哲学上或在艺术上有其出色的名声，而不是同时在其财富上也受人称许的。伯里克里斯和菲狄亚斯时代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正如佩特拉克和拉斐尔时代是意大利的商业繁盛时代一样。在这方面，财富的力量是几乎万能的。它使威尼斯由洼地的中心上升起来，在荒凉的沙岛上建设起来，它使不卫生的荷兰沼泽地成为文学、科学和艺术爱好者的乐园。在我们自己国内，财富的影响也是同样的显著。我们的哲学家、诗人、学者、艺术家的数目与声望，一直是与公众财富或对他们劳动的报偿与荣誉成正比例地增加。

占有财富对个人的生存与安乐以及对国家文化的进步既是这样地重要,而研究财富来源的努力却是这样地少,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被人视为综合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是有理由引起我们的惊异的。对这门科学不应有的疏忽是有许多原因的,但古代的家庭奴隶制度以及现代欧洲大学教育计划开始形成时的黑暗时期这两点,似乎有其极大的影响。

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认为从事于象现代欧洲居民所从事的主要职业是有损尊严的。他们不以自己的勤劳使自己富有,而是依靠于奴隶们的非自愿的劳动以及从被征服的国家所取得的补助。在有些希腊城邦国家里,公民被禁止从事任何类似制造业和商业等类的行业。在雅典和罗马,这样的禁令虽不存在,但这类行业都认为是不值得自由人去做的,结果是这类工作完全由奴隶或下层人民去担任。甚至如西塞罗这样精通古代世界所有哲学并做到了使自己超越于当时当地许多有偏见的人,也毫不犹豫地肯定,在作坊里不能有高贵的事情,认为经营小规模的商业是卑下的和值得轻视的,但当其扩展到最大规模来做时,则完全可以原谅——*Non admodum vituperanda!* (不应受到轻视!)^① 农业,诚然较被重视,在罗马历史上的较早时期,一些最有名的人物都曾积极地从事于耕作,但是,虽有他们的榜样,然而在共和国的昌盛时期,以及在帝国时期,对土地的耕作事务,几乎完全由属于地主的奴隶及雇佣工们所担任。大部分罗马公民,或是服军役^②,或是靠被征服的

① “只付给雇工们劳动工资而不付给技术工资,这样所获得的利润,是卑鄙肮脏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的工资是带有奴隶性的。投机倒把也是卑鄙的,因为他们不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就不会获得什么利润。手工业也是卑鄙的职业,作坊也不是正当职业……小买卖也是卑鄙的,但买卖大而广泛,从各地运进物资,不采用欺骗手段而分配给大家,是不应受到轻视的。”《论义务》(De Officiis)第1卷,第42节。

② “士气超于一切;因为它给罗马人民和罗马城带来了不可磨灭的荣誉。”(西塞罗:《为穆勒纳的辩护词》)

省份供给谷物，过着一种不稳定和依赖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对于现代欧洲所存在的地主与佃户、以及主人与仆役之间的关系是不知道的。结果，古代人，对那些构成经济科学如此重要的部分，如由于地租与工资涨落而引起的有趣的和重要问题，是完全生疏的。古代世界的哲学精神也是极端地不赞同研究政治经济学。富有者的豪华或较优美的生活方式为古代道德学家们视为是头等的灾祸。他们把这看作是腐蚀尚武精神的，而尚武精神则是他敬重的首要项目。所以他们贬斥积聚财富的欲望，认为它包藏着最有害和破坏的力量。在充满如此偏见的头脑中，要使他们把政治经济学成为注意的目标；或使他们研究那些经常被轻视的东西和被诽谤的生产财富的劳动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高等学府里，牧师几乎是当时所有少许知识的唯一所有者。因此，他们的情感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对于他们所编制的教育计划，具有深刻的影响乃是自然的事。文法、修辞学、论理学、神学和民法形成了全部学习科目，要请教授来解释商业原理和最有效地使用劳动的方法，将会同样地被认为是不必要并有损科学尊严的。古代人对商业、制造业和奢侈的偏见，在中世纪仍然保持着有力的影响。没有人对于国家财富、快乐与繁荣的真正源泉具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来往是极端有限的，它们只赞成掠夺、侵犯和海盗式的征伐，以夺取赃物，而不愿以商业来满足彼此的真正需要。

这些情况足够解释这门科学之所以后起和直到很近才引起小小注意的原因。可是，自从它变为较普遍注意和研究的目的以来，在这门科学最有名的学者们之间所存在的分歧意见已经证明对它的进步极为不利，并且因而产生了一种不相信这门科学能建立完善结论的倾向。

但是很明显，那些不相信政治经济学结论的人，由于人们对熟

识现象的解释已形成了各种流派，因而同样地几乎对任何一门其他科学的结论，都不予置信。历来为最贤能的医学家、化学家、自然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所认可的各派分歧，正如最贤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分歧一样。但谁能因此就下结论说，医学、化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学是没有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它们不能对我们提供一个稳固而前后一致的真理呢？我们不能因为牛顿和拉卜拉斯推翻了托勒密、布腊埃和笛卡儿的假设而就怀疑牛顿和拉卜拉斯的论证，为什么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推翻了前人关于财富的源泉与分配的理论而我们便怀疑他们的结论呢？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免除共同的命运。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在短期之内趋于完善，或多或少的谬误常常会侵入它们早期拓荒者的理论中。但政治经济学以前所沾染的错误，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稍许留意观察一下，就能看出政治经济学无疑地和任何其他建立在事实与实验上的科学一样，是能够得出其肯定的结论的。

生产和财富积聚以及文化的进步等所依据的原理，都不是由法律所制定的。人必须自己努力去生产财富，因为他不能没有财富而生存，在每人胸中都有一种欲望，想要在人世间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改善自己的境遇，这就使他不得不设法节约和积累。所以，形成这种科学基础的原理，一部分是由人的本质，一部分是由物质世界构成的，它们的作用和机械原理一样可借助于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但在自然科学与道德学及政治科学之间是有其实质上的区别的。前者的结论适用于每一个场合，而后两种的结论则仅适用于大多数场合。财富的生产与积聚所依据的原理是附着于我们的本性的，对每一个人的行为都能发挥其有力的影响，但却常常不是同一程度的影响；所以理论家只须拟定他的几条一般规律，使之在大多数场合下能解释其作用，而让观察者的敏感来改变它们，使它们适合于个别的场合。这是一条伦理科学中的公认原理，在政治经

济学中同样有效。人类的绝大多数，而不是任何个别人或任何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对于引导他们达到他们自己利益的是什么，极为清晰；因此，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认为适当的任何行业是一个有效的政策。这就是一般的理论；这是一个建立在最广博经验之上的理论。然而这又不同于那些制约行星体系运行的规律——在二十个例子中，十九个是正确的，但第二十个就可能是例外。然而对于经济学家并不要求他的理论和某些人的某种偏见相一致。经济学家的结论是从观察许多大小国家用来支配人们生活条件的各种原则而得出的。他必须研究人的整体——由国家而不是由各个家庭着手——研究大多数人的热情与癖好，而不考察偶然影响社会上孤立存在的一群人的那些东西。

必须经常注意，经济学家的业务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研究个人财富增减的方法，而只是说明它们的一般作用与影响。公共利益应当永远成为他注意的唯一目标，他不为特定阶级增加财富与享受而设计制度和规划策略；而是要发现国富的源泉与普遍的繁荣以及使它们能具有最大生产力的方法。

的确，不同意政治与经济科学业已完善建立起来的某些真理，是太普遍了，说它们与这个或者那个事实不相符合，所以它们必须遭到反对。但可以肯定，这些反对往往是由于对这门科学性质的完全误解。很可能有一千个例子证明有人由垄断而致富，正如有时用抢劫和掠夺而致富一样，但如果不进一步考察，即从这里作出结论，说一般社会都能用这样的方法而致富，那将不是一个小的轻率！虽然这只是政治经济学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但问题绝不在于采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或由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使其致富的人数是多是少，而是在于这种趋向是不是能使大众致富。垄断和限制性的管理往往认为能使某些人积累大量的财富，但这正如人们所经常争论的，远不足以证明其真正有利，而明明白白是相反的。可

以明确地肯定，假如垄断和特权能使少数人致富，则它们必定在同样的程度上使多数人贫困；从而破坏了在每个制度中都作为主要发展目的的国家财富，同时也破坏了劳动的天然自由。

所以，为了在经济科学里得到一个基础稳固的结论，只仅仅观察某些特殊情况的结果或这些结果对特殊个人的影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这些结果是否经常地和普遍地适用；在一种条件下，产生这些结果的某些情况，是否能适用于社会上每一个条件及每一种场合而得到同样或类似的结果。一个理论与同样的和经常出现的事实不一致，必定是理论的错误。但如观察到某一不同于我们习惯经验的特殊结果，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辨别它周围的环境时，不应该马上就改变或拒绝那些能适当解释大多数现象的原理。

只少数几个专制君主，曾经有过公正、仁慈和慷慨的事例，并不足以推翻告诫人们的这条规律：滥用权力的本质，即是对权力所有人的腐蚀和败坏——促使他们傲慢、残忍和多疑；同时，那些只注意目前的享受，忽视未来的人，大肆挥霍和无谓浪费钱财的例子，也不足以使下面这个一般结论归于无效：积蓄财富的热情，比之于耗费的热情是无限的强烈和普遍。假如不是这样，人类绝不会迈出野蛮的状态。人类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国家所作出的无数惊人伟大的进步，例如森林砍伐了，沼泽和湖泊被疏浚并使之适合于耕种了，港口、道路、桥梁修筑起来了，城市和大厦建设起来了，——这些都是把收入储蓄起来的结果；即使有成千的奢侈例证可举，它们仍然显示着积蓄原理的无限权势和最高力量。

由于没有注意到这些道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曾发生了许多错误与误解，甚至现在还受其影响。几乎所有连续不断出现的荒谬理论和意见，都曾诉诸事实而得到证明。但只知道事实而不知道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是原因，那是结

果——用萨伊的例子来说，这还比不上一个编印历书者的未经消化过的学问。因为它不能提供任何方法来判别一个普通原理的真伪。

不应忘记，有许多貌似可靠的事实，常常被引用来证明一般原理的谬误，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些事实观察得很不认真，同时对它们周围的环境，也没有清楚地加以说明，以致使它们完全不值得注意。正确的观察，需要有相当高度的理解力与辨别力，和没有偏见与耐心的研究，而这只是属于少数人的事。用大家闻名的寇伦医师的话来说，“有一种情况是会贬低经验这个名称的尊严的。一个事实的最简单的说明往往包含着不少的理论。有人认为一个不曾受过高深教育的人说出来的话，更可能包含着更多的真实情况。但这里将会发现一条不变的规律：在医生的职业中，愈是深入下层，一般观念中的假设愈多。再者，在任何情况下，纵然很小心地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也不可能把有关的情况，完全包括无遗。因此，在通常所谓的经验里，我们仅仅有一条规则：就是从从一个不完全知道的情况转到我们大家都无知的情况。所以，错误的最大来源，是应用演绎法，即从一种情况的结果，推论到另一个条件完全不同的情况。没有经过分析推理而得出的原理，经验只不过是一种无用的、盲目的指导。”（寇伦书信手稿）

任何一个人，如有机会比较一下大多数普通观察者关于影响公众利益的各种措施的实际影响与真正作用的各种不同意见，必定相信寇伦医师的说法，对于政治与经济科学比之对于医学还更适用。完全不为普通观察者所注意的情况，往往对国家的繁荣起着最有力的影响，那些刺激他们而使其认为最重要的情况，往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它为许多条件所影响，如果没有最大的技巧和审慎的能力，并参与研究和缜密的分析，同时能熟练掌握科学原理的话，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完全不可能辨别事

物的原因与结果的,并往往会把这一系列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归之于另一系列原因中去。观察事物,既是如此的困难,所以,毋庸奇怪,“流传在世上的虚构事实,一定是无限地多于虚构的理论。”(寇伦医师)所以,对某一个孤立的事实,不管怎样审慎地加以考察,仍如上面所指出的理由一样,绝不能构成一般理论的任何基础,不论是伦理科学或政治科学都是这样。那些在狭隘的基础上提出理论的人们,几乎总是经验主义者,他们的虚荣或利益,促使他们从狭隘的和不完全的观察范围内,建立了与人们一般经验不一致的结论。

虽然,我们不因少数结果,与某些我们还不熟悉的情况有明显的违背,就拒绝接受大家所公认的原理,但如果这些原理不是根据大量的材料和谨慎的推理所归纳出来的话,我们对它仍可怀疑。为了获得关于决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真实知识,经济学家应当从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收集材料。他应当研究不同环境的人;他应当借助社会、艺术、商业和文化等历史,借助哲学家和旅行家的著作,总之,借助任何一个能说明加速或延缓文明进步原因的事物;他应当把全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人类幸福与生活境况所发生的变动,标志出来;他应当追溯工业的兴起、发展与衰落;更重要的是,他应当细心地分析和比较不同制度和管理办法的结果,并区别决定进步社会与落后社会互不相同的各种情况。这些研究,由于阐明了国家的富裕和高尚以及贫穷和衰落的真实原因,对经济学家提供了资料,使其对财富科学中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能给以满意的解答和制定旨在保证社会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行政计划。

这样的研究,决不致于不激起每一个正直的人的深厚兴趣。人们不能对其施加最小影响和不能控制的天体运行规律,尚且被公认为高尚和合理的研究目标。而支配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

它们使这一部分人进入富裕和高尚，同时使另一部分人下降到贫穷与野蛮的深渊——在我们思想上，应当更有无限强烈的注意，因为它们既对人类的幸福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它们的效果可以、而且在事实上也正不断地为人类的干预而改变。国家的繁荣兴盛，主要不是依赖于有利的地带、温和的气候或肥沃的土地，而是依赖于采用适合于鼓励天才的创造力和给予劳动以毅力和积极性的措施。创立一个健全的公共经济制度，能够补偿任何一种其他的缺点：它能使本来荒芜不毛和不具生产力的地区，变为文雅、高尚和众多、富裕的居民的舒适的栖息之所。如果没有创立这样的制度，则自然界的最好赐予，也是没有价值的；具有发展的最大潜力，并富于生产财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的国度，也只能艰难地提供其游牧者以可怜的生计，并仍以其愚昧、野蛮与不幸而见称。

当我们回顾一下建立健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前人的庞杂和广博的学问时，那末我们对经济学家曾经陷入的错误，或对某些重要论点仍有不同的见解，便不会感到惊异了。政治经济学是新近才兴起的科学。虽然各种颇具价值的论文，以前曾零星出现过，但直到上世纪中叶，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或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过。这种情况的本身就足以解释历来所发生的许多错误体系了，几乎每一科学部门的第一批拓荒者，他们的结论都不是从比较某些具体事实，细心研究各种原则发生作用时所呈现的现象，以及同一原则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作用而推论出来的，而是在很狭窄和不稳固的基础上开始创立他们的理论的。但要他们从另一个方向去作，实在也不是他们的力量所能容许的。由于他们本身的原因，他们很少做过，同时也没有特殊注意过调查研究。直到为了提供一个标准以核实某些著名理论的真伪时，这个问题才开始被注意到，并做了相当数量并具有适当准确性的调查研究。用一句这门科学的术语来说，只是由于理论家的有效需求，才产生了备研

究用的事实或原始资料，理论家以后就运用这些事实和原始资料来构成他们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显明地证明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如已经指出过的，那些为古人所完全不知，直到晚近才为我们的祖先所注意到的那些能使我们以最大的认真态度用以判断古代著名国家和中古欧洲居民的财富和文明情况，却被史学家认为不值得注意，或论述得很不完全和很不细致。所以，开始研究这门科学一般原理的人，只能把他们的结论建立在比较狭窄和不充分的经验上。他们甚至很少利用很容易就能熟悉的某些历史事实，而是几乎把注意力局限于自己观察范围内所遇到的一些情况。

曾经流行一时的一个观念，认为财富只包括黄金与白银。这自然是由于当时所有文明国家的货币，几乎完全为这两种金属所铸成的情况所致。曾经被用作测量各种商品相对价值尺度及商品等价交换物的黄金、白银或货币，获得了一个人为的重要性，它们不独被用来估计一般平民的地位，而且被用来估计显赫人物的地位。其实，所有的买和卖，实质上不过是这一商品对另一商品的互易，例如，一定量的谷物或布匹交换一定量的黄金或白银，反之亦然，这一简单和具有明确意义的观念，却完全为人所忽视。人们的注意力渐渐从货币的价值转移到货币本身；个人和国家的财富，不由他们可处理的产品数量来衡量，即不是用他们能够用以购买贵重金属的商品量和价值来衡量，而是用他们实际所有的这些金属数量来衡量。结果，禁止黄金和白银出口，鼓励其进口来企图增加国家财富的数量即成了显明而普遍的政策。

在西塞罗著作中，有一段谈到罗马共和国时期，贵金属屡次被禁止输出；^①这个禁令屡次为罗马皇帝无目的地重申

^① “不论是从前还是我做执政官时的元老院，都再三庄严地宣布过禁止黄金出口。”（《为弗拉谷的辩护词》第28节）

过。^① 在现代欧洲，似乎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早期法律，没有明文禁止过黄金和白银的输出。据说在入侵以前的英国法律，就曾经禁止过黄金与白银的输出，并为了同一目的，禁令在以后时期又一再重申过。其中的一个是 1515 年制定的法律（亨利第八法律第三号，第一章），宣布携带任何铸币、贵金属杯碟器具、宝石等等出海，一经拘捕，应罚以所携禁物二倍的罚款。

十五和十六世纪商业的异常扩张，引起一种更细致和更繁杂的增加贵金属供应的制度，替代了以前所制定的粗率和简陋的制度。经过好望角与印度直接交通路线的建立，对这个变动似乎有其极大的影响。贵金属一直与其他最有利的物品一道，输出到东方去。不管反对输出贵金属的偏见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东印度公司在 1600 年成立之初，即取得每年输出价值三万英镑的外币、或金银块的特许，条件是他们每次航行终了的六个月內，除第一次航行外，必须输入与他们输出的白银价值相等的黄金和白银。但是遭到公司敌对者反对，说允许黄金与白银输出王国是不妥当的，它违背了所有的原则，高度地损害了公共利益。商人和其他支持公司的人，如不公开非难绝对禁止输出贵金属的传统政策，就无从驳倒反对者的理由。但他们却不敢去辩驳，同时他们也确实没有理由能相信输出金银块到东方，用以购买的商品对英国一定会有较大的价值。但他们事实上还是辩驳了，他们说，把金银块输到印度是有利的，因为从那里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转口输出到别的国家，从这些国家得到的金银块，要比在印度必须付出的数量为多。托马斯·孟先生是东印度公司赞助人中的最能干的一个，他巧妙地把商人输出金银从事买卖的作用和农业的播种时间和收获季节作

^① 当普利奈估计意大利输入的蚕丝、香料及其他东方产物时，曾说：“据最低估计，每年印度、塞肋斯（Seres，在古代指远东地区的国家，特别是指盛产蚕丝的国家。——译者）和阿拉伯半岛要从我们国家攫取十亿铜币。”（《国史》，第 12 卷，第 18 章。）

了对比,他说:“在播种的时候,农夫把许多好的谷粒,撒到泥土里,如果单在这时来看农夫的行为,我们准会说他是个疯子而不是农民。但秋天我们看到他的劳动成果,他努力的结局,那时我们就会发现他的劳动的价值和丰硕报酬。”^①

这就是所谓重商主义的起源:较之于以前完全反对金银输出的偏见——因它够不上称为主义——应该承认采用重商主义是向着正确的意见前进了一大步。重商主义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认为黄金和白银单独构成财富。但是他们认为,正确的政策应允许金银的输出,但输出金银所买进的商品全部或其一部,以后转卖给别的外国时必须比原来购买这些商品所支付的金银数量为多;或是输入的外国商品使本国产品,比在不如此的情况下输出得更多,也就是说,必须超过输入商品的费用。这些见解必然导向贸易平衡这个有名的学说。很明显,除了偿还输出的商品,贵金属不可能输入到没有富源的国家去。重商主义拥护者的最大目的是要最大可能地垄断贵金属的供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鼓励输出,限制除黄金和白银外几乎所有其他产品的输入,而黄金和白银则既经输入,即不准备再行输出。结果是输出价值超过输入价值就被视为国家在积累财富事业中进步的唯一原因和方法。这个差额,被认为是除非输入等量价值的黄金或白银——或者说,是当时认为的一个国家所能够具有的唯一真实财富——是不能平衡的。

重商主义的原理和结论,纵令是绝对荒谬和错误的,但对一些非常显著的现象,还提供了尚可过得去的解释;更值得一提的是,

^①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第1版,第50页。此书是在孟死后很久1664年出版的,很可能是在1635年或1640年写的。孟很久以前就提出了同样的理论,在他1609年出版、1621年重印的《东印度商业的保护》(Defence of the East India Trade)及由他起草的1608年(?)由东印度公司呈交国会的请愿书中,几乎是用同一的词句提出了这个理论。

它们和这个论题的一般偏见是完全吻合。商人和实际从事业务的人是重商主义的创立者，他们认为不需要把所设定的原则加以任何很精密的分析与探讨，而把这些原则看作是由人们的普遍同意和承认所建立的。他们自己则几乎完全从事于研究能给他们最大效果的实际方法。

孟先生说：“虽然一个王国可以由所得的礼物或由购自他国的货物而增加财富，但这些事情到底在什么时候发生，是没有把握的，也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我们可以假定，这个王国获有布匹、铅、锡、铁、鱼类及其他国产的充分供应；另外，每年尚有价值二百二十万镑的剩余货物输往外国，靠着这笔出口，我们能够从海外买到并输入约二百万镑的外国货物，以供我们使用和消费。我们在贸易上遵循着这种惯例去做，就稳定可以保证我们的王国每年一定会增多二十万镑的财富，并且一定是大部以现金的形式带回祖国；因为在我们所出口的货物里，既然有一部分没有以货物的形态换回一些东西，它必然就会以现金的形态被带回本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 11 页。）

这里假定对外商业的所得全部是黄金和白银，并认为必定要带回国来，以偿付商品输出的超额。孟先生没有着重说明对外贸易可以使我们得到无限种有用的和喜欢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我们或是完全不能制造，或是在国内制造不如在国外购买便宜。他只希望我们考虑财富的这种增加——而一切因商业刺激劳动动机的巨大增长，以及酬报劳动者勤奋的舒适品和享乐品的巨大增加，都认为是无所谓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钉在二十万镑黄金与白银的余额上！这正如希望我们用钉在衣服上的金属纽扣的个数和其闪烁发亮的光辉，来估计由一套衣服所能得到的舒适和好处一

样。但是孟先生在这里所讲的对外贸易利益的估计方法，久已为大多数商人和政府官员认为是正确的。这自然是传统偏见的痼疾。我们至今仍然还庆幸我们每年的输出超过输入呢！

但是，除了关于贵金属的错误观念，并由此引起的限制企业自由的立法和保证重商主义的优势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情况。罗马帝国西部各邦的封建政府，很早就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国王们自己不能约束大男爵们的篡夺，或控制他们的反抗，于是以利益来笼络城镇居民，以期加强他们的影响和巩固他们的权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给居民以特权，允许他们自治，取消各种现存的奴役痕迹，把他们组成社团或政治团体，由他们自选的参议会和长官管理。这样，在城市里是有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居民们享有了财产的安全，而国家的其他地方，则成为劫掠的鱼肉，混乱不堪。这便刺激了工业，给予他们一个较耕种土地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使国王们从城镇里得到了他们大部分的货币供应；由于城镇居民的帮助和合作，国王们有了可能来控制 and 克服男爵们的骄傲和不服统治。但城市公民资助君主们并不只是为了报答原先所赐予他们的特权，他们继续请求并想得到新的特权。国王们也不能对城市居民的请求表示任何踌躇，因为他们使市民负担了很多义务，同时，国王们也正确地估计到城市居民，是他臣民中最勤劳和最应该受到奖励的部分。为使他们得到廉价的供应，使他们的工业能够最有利进行，谷物和他们制造所需的原料是严格地禁止输出了。同时，为阻止工业品从外国输入，并使本国制造商在国内市场取得完全垄断起见，还设置了高关税和颁布了绝对禁入令。这些措施，连同对有社团组织的城市公民所给予的特权，即任何个人未经批准脱离组织，不得从事任何行业的特权，以及一些旨在加强输入制造业所需原料及输出工业品的辅助管理办法，形成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每一个国家用以鼓励制造业所采取的公共经

济体制的主要特点。他们把往时法律所承认的企业自由，几乎全部破坏了。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中，这种过分的人为制度的实例，可以很方便地举出千个以上。但这种实例，许多已为读者所熟悉，所以为了说明它的立法精神，我只举出 1678 年英国为鼓励羊毛制造业而通过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规定，所有死尸都必须用羊毛寿衣入殓。

但是只排除国外竞争和垄断国内市场，还不足以满足工业家和商人的要求。他们从国家得到了可能得到的利益以后，接着便企图彼此倾轧。他们中最有力的人得到了专门经营某一行业的特权，用以排斥别人的经营。当伊丽莎白在位时，这种弊端，达到了难以忍受的高度。她颁发无数的新专利权。最后，抱怨发展到不能制止了，以致引起所有的阶级都联合起来请求废止。但遭到了皇室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树立垄断权力，是授予特权中最有价值的一种，最后于 1624 年才通过一个法案取消。这个法案，产生了很大的利益，但没有触及重商主义或工业体系的任何基本原则。所有社团的专利权，仍不受这个法案的限制。

在法国，制造家的利益为路易十四王朝极盛时期的著名财政部长科尔贝所热情袒护。1664 年在他领导下所编订的关税税则，第一次宣布了。大陆上的作者有时认为是重商主义的真正纪元，但依我们所见，这是很大的误解。〔芒果提：《科尔贝主义论》(Dissertazione sul Colbertismo)，第 2 章。〕

维护制造业的各种禁令，为重商主义和贸易差额的赞助者们所热情拥护。给予本国制成品以输出的便利，和阻止外国货的输入，被视为特别适合于造成输出超过输入，以取得贸易顺差的利益。所以，他们不认为这种管制是自私垄断精神的产物，而认为是最英明政策的标志。工业家和商人的利益，是这样自然的一致，他们的利益并且被认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获得支付上

的顺差是必须达到的最大目的；高关税和禁止输入、奖励输出和保险金是达到这个方法。毋须惊异，一种制度，既有这样普遍的偏见来拥护它，同时对工商界所享受的专利权又给予似是而非的辩解，它总要及早产生强有力的实际影响，或者说，纵然它的原则被推翻了，它仍然会保留这种影响。^①

一个已故的外国作者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肯定，很少有的政治上的错误产生过比重商主义更多的不幸。它以权力来控制 and 禁止了它只应该保护的东西。它掀起了管制的狂热，在很多方面危害了工业，迫使它离开自然发展的道路。它使得每一个国家认为邻国的福利和本国不能相容，因而彼此互相毁伤和破坏，使商业上的竞争精神，成为现代许多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原因。正是这个制度鼓励了国家采用武力或机诈，强迫其他弱国或落后国家订立对他们自己也不产生真正利益的条约。它建立了殖民地，使宗主国可垄断它们的贸易，并迫使他们完全依赖宗主国的市场。总之，只要这个制度在那里产生过一点损害，那里的国运昌盛的发展就受到阻碍；在另一些地方，它用鲜血冲洗了土地，减少了人口，破坏了其中一些富强的、本来可以有高度发展的国家”。〔斯托赫：《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第1卷，第122页。〕

十五和十六世纪的那些永远有意义的伟大发现和事件，震撼了以往的偏见和制度；文明和工业的进步，自然会吸引着人们以更大的注意，考虑着国家富强的根源。这就给重商主义的没落铺平了道路。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由于他们本身的利益，首先促使他们对当时流行的关于金银块输出的学说，发生怀疑；从而逐渐唱起了一种高调，最后终于勇敢地申辩，认为金银块并不是别的，只不

^① 法国的默龙和福崩奈，意大利的杰诺韦西，英国的孟、蔡尔德勋爵、达文南博士、不列颠的一些商人作家以及詹·斯图亚特勋爵等，都是很有名能干的著作家，他们除了很少的例外，或多或少都拥护重商主义的原理。

过是一种商品而已，它的输出应该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的自由。这样的看法也并不只限于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它逐渐地传播给了别人；影响所及，许多有名的商人对曾为大家所公认的教条，也采取了怀疑的态度。这就使商业往来方面的合理原则，获得了比较正确和全面的看法。这些新的意见，终于传到了下议院，1663年禁止外币和金银块输出的法令取消了，准许东印度公司和私商有无限量输出这些物品的自由。

除了关于东印度贸易的争论以外，关于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的建立，济贫法强迫条款的采用，禁止输出羊毛法令等等所引起的讨论，吸引大家对国内政策问题的特殊注意。在十七世纪中，有关商业和经济课题的专论，较平常更多地出版了，虽然其中还有许多仍强烈地带着当时流行的时代精神，但不能否认，它们之中还是有许多超过了同时代的偏见，并无疑地应视之为现代商业理论的基础，应视之为健全的和自由学说的早期阐述。它们认为国家的昌盛，决不能用限制的法令或邻国的萧条达到，商业的真正精神和垄断的黑暗、自私和浅薄的政策绝不相容，人类的自利心和他们的义务一样，都要求他们和平相处，并培养一种公平、友好的相互交往精神。

除孟先生外，蔡尔德勋爵^①的著作虽然建立于重商主义原则上，但包含许多健全的和自由的见解，威廉·配第勋爵^②和达德利·诺思勋爵是十七世纪最出色的经济学作家。诺思不独超出了当时已形成的偏见，而且相当锐敏地发现了新近出现的一些比较微小而不很明显的谬误。他1691年出版的《贸易论》，特别着重于利

① 《贸易新论》(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1668年初版; 第2版发行于1690年, 有很大的增订。

② 《货币略论》(Quantulumcunque), 1682年出版; 《爱尔兰的政治解剖》(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年出版; 还有其他著作。